

# 評析《史記》論劉邦的功業與歷史定位

楊自平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 摘 要

本文旨在分析太史公如何解釋劉邦集團建立漢帝國原因及對劉邦的評價。文中指出太史公認為漢帝國的建立，異於三代及秦朝的立國方式——憑藉諸侯國的地位，加上開國之君為聖君，或是數代國君不斷進行軍事擴充，方能建立新王朝。劉邦以一介平民，憑藉本身英雄的條件，率領一群基層官民乘勢而起。秦朝末年的動亂與陳涉、項梁起義，為劉邦提供有利的情勢；而劉邦的政治天賦與三傑不世出的長才，為時代開創新局。太史公對劉邦的描述與評價，不單依道德標準與事功價值，而是採取歷史判斷，從歷史發展角度，深入分析劉邦開出平民建國的歷史先例，並隱約透顯劉邦立國後，所表現出濃厚的「家天下」思想。太史公的作法，提供一條吾人評論自身歷史的可行途徑。

關鍵字：史記、劉邦、太史公、項羽、漢初三傑、韓信

## 壹、前言

目前關於劉邦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型，一是以通俗、實用為進路，包括傳記、歷史小說及管理學應用等；<sup>1</sup>一是屬專業學術研究，主要有兩條路數，一是就劉邦個人的特質論述，

---

<sup>1</sup> 此類者如：李偉，《弱勢大贏家：劉邦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臺北：詠春圖書，2001年。王志剛，《劉邦：弱勢贏家的99加1韜略》，臺北：正展出版社，1900年。陳文德，《弱勢大贏家：劉邦大傳》，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季燁，《劉邦》，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3年。司馬遼太郎著、鍾憲譯，《項羽對劉邦：楚漢雙雄爭霸史》（上）（下），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年。秦漢唐，《楚漢爭霸——劉邦用人方略》，臺北：文經閣出版社，2005年。翟文明，《劉邦圖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年。張鳳洪，《大風之歌（漢高祖劉邦）》，中國帝王系列，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孫文聖，《劉邦》，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6年。黃中業，《漢高祖劉邦傳/毛澤東評點的帝王大傳》，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一是就集團層面論述。<sup>2</sup>

近人分析劉邦何以得天下，大抵可分為綜論式與分論式，綜論式是強調劉邦的核心特質，而分論式則重在指出劉邦的多種特質。前者如牟宗三先生從「豁達大度」盡氣的政治天才來論斷劉邦，<sup>3</sup>林聰舜先生亦以「意豁如也」為核心論述劉邦，強調此特質所展現的帝王氣度與對人才的吸引力，及此特質表現於才智之士的任用與在政治、日常生活方面之表現。<sup>4</sup>相較綜論式者，採分論式作法者較多，賴漢屏先生指出劉邦所以得天下的四種特質：審時度勢、順應民心、雄才大略、知人善任。<sup>5</sup>胡安蓮先生亦指出劉邦成功之四要件：臨危不避，敢作敢為、身先士卒，足智多謀、善得民心、量才而任人。<sup>6</sup>韋天富亦提出劉邦成功的七個因素：歷史需要傑出人物、擁有武裝、善於聯合、趨利避害、思賢若渴、百折不撓、建立鞏固的後方。<sup>7</sup>

除上述從正面特質評論外，亦有學者兼論劉邦性格的正面性與負面性。孟祥才先生認為：「在司馬遷筆下和班固的筆下，他時而可愛，時而可憎；時而可笑，時而可畏；時而聰明，時而愚蠢；時而謙虛，時而高傲；時而大度，時而小氣，而這一些特點又都有機地統一在劉邦一個人身上，形成一個即其生動的多角形象。」<sup>8</sup>陳瑾先生則提出：「『英雄天子』與『無賴流氓』的二極背逆」。<sup>9</sup>此外，亦有論文以劉邦與項羽的比較為議題，以見出二人性格及才能的差異。<sup>10</sup>

至於集團方面的研究，是以劉邦及所領導的劉氏集團為研究議題，其中亦包含對集團成員的個別研究。在劉邦的用人方面之研究，主要重在指出其識人、用人能力，並指出其善於

<sup>2</sup> 專書方面，如安作璋、孟祥才，《劉邦評傳》，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孟慶華等，《劉邦評論》，江蘇：「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2000年。詹士模，《反秦集團滅秦與分裂戰爭成敗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論，2003年。期刊論文方面，如李威熊，〈創業的典範—劉邦〉，《幼獅月刊》，48卷6期，1978年12月，頁13-17。李開元，〈前漢初年軍功受益階層的成立〉，《史學雜誌》，108期，頁1017-1890，1999年。段莉芬，〈《史記》人物論：高祖劉邦〉，《建國學報》，第13期，1994年，頁23-35。孫永忠，〈《史記·高祖本紀》中四篇「告諭」析評〉，《輔仁國文學報》，第13期，1985年，頁97-119。王文顏，〈司馬遷筆下的高祖形象〉，《孔孟月刊》，第27卷12期，1989年，頁27-35。趙文潤，〈重評劉邦、項羽的成敗原因及是非功過〉，《人文雜誌》第6期，1982年6月，頁86-90。陳玉屏，〈劉邦與異姓諸侯王〉，《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頁8-15。芮和蒸，〈漢高祖完成帝業的分析研究〉，收於王壽南等撰，《政治史》，臺北：漢苑出版社，1988年。韋天富，〈論劉邦成功的七個因素〉，《廣西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頁64-69。崔向東，〈論劉邦項羽的性格及對成敗的影響〉，《錦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頁32-36。曹家齊，〈劉邦分封與西漢統一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1期，頁46-49。

<sup>3</sup> 牟氏說法見於《歷史哲學》第三部「楚漢相爭：綜論天才時代」及第四部第一章「蕭規曹隨，躬修玄默」皆有論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

<sup>4</sup> 《史記的人物世界》〈「意豁如」所呈現的生命風姿與政治能力—劉邦的性格與政治才華的結合〉，臺北：三民書局，2003年，頁95-120。

<sup>5</sup> 《史記評賞》，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頁32。

<sup>6</sup> 〈司馬遷筆下的漢高祖形象〉，《南都學壇》第18卷，1998年，頁57-59。

<sup>7</sup> 〈論劉邦成功的七個因素〉，《廣西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頁64-69。

<sup>8</sup> 《先秦秦漢史論》，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82。

<sup>9</sup> 〈自我實現的內在人格—論《史記》中劉邦形象的審美意趣〉，《浙江師大學報》，1997年第6期，頁25。

<sup>10</sup> 如崔向東，〈論劉邦項羽的性格對成敗的影響〉，《錦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頁32-36。

駕馭人才。<sup>11</sup>此外，針對整個集團特色分析者，<sup>12</sup>以及探討劉邦與三傑之關係，<sup>13</sup>三傑之間的分析與比較，<sup>14</sup>以及對三傑的個別研究。<sup>15</sup>

雖然前述各論著對劉邦及三傑的性格、能力分析極深入，但仍無充分說明劉邦何以能建立漢朝。還必須加入一重要條件，即歷史發展的趨勢。太史公於〈太史公自序〉、〈秦楚之際月表序〉，以及〈高祖本紀〉、〈陳涉世家〉、〈項羽本紀〉之「太史公曰」均深入論及秦漢間時勢的變遷。<sup>16</sup>

<sup>11</sup> 韓雪風，〈劉邦用人之道研究〉，《史學研究》，1994年第1期，頁70-72。郝建平，〈人才與事業成敗—劉邦用人特色淺析〉，《陽山學刊》，1996年第3期，頁37-44。肖振宇、張永華，〈劉邦統御之術述評〉，《張家口師專學報》，2002年第1期，頁21-24。

<sup>12</sup> 曹家齊，〈劉邦布衣集團與西漢政權的建立〉，《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頁91-95。

<sup>13</sup> 王燕，〈從劉邦與蕭何的關係看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濱州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頁32-33。郭秀琦，〈從戰國時期地主階級人生價值觀看劉邦與韓信的關係〉，《陰山學刊》，1996年3期，頁45-50。

<sup>14</sup> 例如：張大可、徐日輝，〈張良蕭何韓信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宋公文、何曉明，〈略論劉邦的謀士群〉，《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頁102-108。陳蘭村、張金菊，〈論《史記》漢初三傑形象的典型意義〉，《浙江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頁66-70。趙文潤、鄭世敏，〈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韓信與蕭何之比較研究〉，《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頁42-49。

<sup>15</sup> 例如：張建國，〈試析漢初「約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談「二年律令」與蕭何關係〉，《法學研究》，1996年第1期，頁154-160。劉正文，〈張良功成不居探因〉，《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頁31-45。劉昌安，〈論張良人生擇向的文化意義〉，《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頁42-49。阮芝生，〈論留侯與三略〉上，《食貨月刊》，復刊11卷2期、第3期，1981年，頁54-71。譚潤生，〈讀《史記》—韓信的榮與辱〉，《中國語文》485期，1997年11月，31-36。譚潤生，〈讀《史記》—韓信的得與失〉，《中國語文》486期，1997年12月，頁28-36。徐勇、黃樸民，〈論韓信「漢中對」的戰略思想及其歷史地位〉，《人文雜誌》，1994年第4期，頁76-79。趙文靜，〈韓信死因新探〉，《錦州師範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頁80-82。肖振宇，〈試談韓信被殺的自身原因〉，《張家口師專學報》，1999年第1期，頁35-37。馬植傑，〈韓信新論〉，《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頁29-33。

<sup>16</sup> 關於秦漢史，專書部分，如林劍鳴，《新編秦漢史》上，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2年。馬非百，《秦集史》，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張傳璽，《秦漢問題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劉開揚，《秦末農民戰爭史略》，北京：新華書局，1959年。徐進興，〈關中對楚漢之爭成敗的影響〉，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秦漢之際之相關期刊論文部分，如許倬雲，〈由新出簡牘所見秦漢社會〉，《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51卷2期，1980年，頁217-232。卜憲群，〈秦制、楚制與漢制〉，《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1期，頁45-53。王仲孚，〈論楚漢之爭的成敗關鍵〉，《國魂月刊》，456期，1983年11月，頁54-56。田靜，〈秦統一後的六國貴族〉，《歷史教學》，1994年第3期，頁37-39。朱紹侯，〈關於秦末三十萬戍守北邊國防軍的下落問題〉，《史學月刊》，1958年第4期，頁10-11。呂春盛，〈試論秦末六國的復國意識〉，《史原》，18期，1991年，頁1-28。夏子賢，〈略論秦王朝的覆滅〉，《安慶師範學院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2期，頁1-8。張濤，〈秦漢騎兵起源及其發展新探〉，《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1卷2期，2001年，頁58-71。郭化民，〈試論有關秦末農民大起義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58年第7期，頁27-33。郭興文，〈秦亡原因新探〉，《文博》，1988年第2期，頁14-21。楊維、任澤全，〈楚漢戰爭試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4年第3期，頁61-66。徐連達，〈秦末社會矛盾再探討—兼評秦楚之際的地方差異性〉，《許昌師範學報》，1992年第1期，頁26-32。廖伯源，〈試從爵邑制度論楚漢相爭之勝負〉，《東吳文史學報》，4期，1982年，頁71-74。劉文瑞，〈征服與反抗—略論秦王朝區域文化衝突〉，《文博》，第5期，1990年，頁52-61。劉雪豐，〈秦末農民戰爭中的懷王心〉，《（成都）《文史雜誌》，1991年第1期，頁19-20。蔡行發，〈試談楚漢戰爭〉，《史學月刊》，1986年第5期，頁12-17。亦有以項羽為議題者，如汪榮祖，〈楚霸王的興亡〉，《歷史月刊》，177卷，2002年10月，頁43-48。閔躍進，〈項羽敗因淺析〉，《婁底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頁70-72。張傳璽，〈項羽論評〉，《文史哲》，第10期，1954年，頁49-53。

本文擬結合秦漢間時勢的變化，進而見出劉邦及所領導的集團如何開創新局，以見出太史公如何評論劉邦，並說明劉邦在歷史發展的定位。若單從劉邦個人特質或集團表現論漢朝的建立，不免放大了劉邦或功臣的能力，不如將之放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下，見出劉邦所處時勢，以及劉邦及其功臣如何憑藉自身條件，開出新契機。如此方能較周全地見出太史公如何解釋劉邦建立漢朝的原因，並給予相應的評價，而此正是《史記》評論劉邦的重要向度。

## 貳、時勢造英雄—秦朝覆亡與陳涉起義

欲探討劉邦得天下的因素，若僅與項羽比較歸結出劉邦性格、才能的特點，或是將一切歸功三傑，皆無法充分說明，尚須結合時勢與英雄兩要件，方能提出較充分的解釋。關於時勢，太史公致力探究劉邦何以五年之間，以平民之姿，建立漢朝。此現象讓司馬遷相當困惑，因為無法從過去歷史發展中找到合理的說明。過去朝代的建立，或如虞及夏、商、周三代因累世積德而立國，或如秦朝因歷世富國強兵，方能建國。故太史公云：「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若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sup>17</sup>

劉邦興漢，既無累世之德，又無百年累積的強大實力，是何因素成就此功業？太史公的答案是「豈非天哉」的「天」。所謂的「天」並非指人格神意義的天，而是指歷史發展的「勢」，正因非人力所為，故稱之為天，即劉邦乃因應時勢而起。

關於太史公對勢的認定，楊燕起先生認為《史記》中的勢，包含兩方面：「一個方面是指帶有綱領性、規律性的事勢發展的總的趨勢」，「另個方面是指某些政治人物在他的活動期限內，作為他的歷史背景的具體時勢。時勢是歷史總趨勢鏈條中的一環，是歷史發展的橫斷面。」楊燕以先生並歸結出《史記》中所謂的勢是指：「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結合的產物，是社會各種客觀條件的交替綜合，是各種社會力量、社會矛盾衝突的集中與概括。」<sup>18</sup>

依楊燕起先生的說法，太史公對歷史變遷有著整體規律性的觀念，並認為發展過程中有偶然性的突發形勢，破壞此規律性。楊氏言道：「當社會處於急速變化的時期，歷史的進程有可能突破它固有的格局，而呈現某種奇跡，於是事勢的發展，就會將一些原本不怎麼顯著的人物，推上歷史舞臺，甚至使他們成為歷史的主宰者。」也因此，楊氏認為劉邦所以得天下，便是順著歷史的偶然性發展。彼言道：「所謂『大聖』云云，無異是司馬遷對劉邦此人沒有真本事的深刻嘲弄。劉邦起於布衣，…他的興，既不是因為積德，也不是因為累力，只是在『五

<sup>17</sup>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年），卷16，總頁307。

<sup>18</sup> 《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74。

年之間，號令三殫』的情況下，撿了一個便宜，恰恰是秦的沒有分封，『墮壞名城，銷鋒鏑』，為他登上帝位掃除了障礙。」又曰：「劉邦是借助於歷史參錯擾攘急速變化的形勢，很快成就了帝業，承受了社會有利的客觀條件，順從了歷史發展的要求，同時也寓譏刺之意。」<sup>19</sup>

楊燕起先生的論點將太史公所言的歷史總趨勢理解為虞、三代、秦的立國模式，或以積德，或以歷世累力之故，而認為劉邦迅速得天下，不是依循前代立國的常例，而是因時代巨變之故，乘勢而起。此論點可解除太史公對劉邦於短時間立國的疑惑。然尚須進一步深入探究，太史公是否將虞、三代及秦朝的立國模式視為歷史常例？對於此問題，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有二：其一，商、周、秦只是歷史發展的部分階段，其立國因素皆與封建制度有關。秦立國後，改行郡縣制，為以降各朝所取法。因此，焉能以三代及秦在封建制的背景下而立國的模式作為必然模式？其二，商、周之立國，雖以德義號召民心，但仍須具備強大武力，方能滅桀、紂之勢力；秦朝更是靠歷代秦君，蠶食鯨吞六國土地，至嬴政一統天下。雖說漢雖不同於秦，以累力得天下，但與項羽間的爭戰，仍屬以力得天下，與商、周、秦仍有部分相似處。綜合上述兩點理由可發現，漢之立國與前代相較，最大的差別應在於封建制與郡縣制背景的差別。正因秦行郡縣制，使得劉邦得以成為第一位平民皇帝，明顯異於商、周、秦的開國之君以諸侯身分而稱帝。

既然三代及秦的立國模式不得視為常例，則太史公所認定歷史發展的常例為何？據太史公自己的說法，即夏、商、周三代所表現出「忠」、「敬」、「文」的循環，以此作為歷史變遷的原則。雖然改朝換代，不得不以武力相爭，但太史公亦看出新朝代的建立代表著時代風格的轉變，而此正是歷史變遷的根本原則。對於「忠」、「敬」、「文」的循環，太史公言道：「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僇，故救僇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sup>20</sup>而此「忠」、「敬」、「文」的說法，亦可簡化為「質」、「文」的觀念。太史公於於〈平準書〉言道：「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無論「忠」、「敬」、「文」的循環，或是「質」、「文」的更迭，皆遠較以虞、三代、秦立國模式視為歷史常例更合太史公的想法。

此外，楊燕起先生對劉邦利用偶然性的事變篡立的說法，尚有兩點疑問。其一，所謂偶然性的勢，並非秦末才有的現象，歷來朝代衰亡之際皆會出現。其二，當時同樣身處此變局者，並非僅劉邦一人，項羽及當時諸侯、豪傑，甚至任何人皆有此機會。因此無法簡單的以劉邦運氣好而得到天下來解釋。

清儒王船山亦曾說明歷史發展中的「理」與「勢」關係，船山主張「理勢合一」，強調理在事中，離理無勢。彼言道：「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之所就，故離事無理，離理無勢。勢之難易，理之順逆為之也，理順斯勢順矣，理逆勢斯逆矣。…守天下者，辨上下，定民志，

<sup>19</sup> 《史記的學術成就》，頁 276。

<sup>20</sup> 〈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史記會注考證》，卷 8，總頁 181-182。

致遠而必服，垂久而必信。理之順，即勢之便也。攻以此攻，守以此守，無二理也，無二勢也。勢處於不順，則事雖易而必難。」<sup>21</sup> 船山所謂的理，即是楊氏所說有綱領性、規律性的總趨勢，順理而行則為順勢，反之即為逆勢；順勢則成事易，逆事則成事難，此為船山所謂「理勢合一」的大義所在。

當時利於劉邦的時勢有四：

其一，秦中央集權制為平民起義提供有力基礎。秦行郡縣制，一旦中央危難，便無法靠諸侯救援；再加上秦始皇頒訂銷毀天下兵器，毀壞名城，拘捕豪強，此些作法都給予平民趁亂世而興的機會。<sup>22</sup>

其二，陳涉、吳廣發難於前，項梁、項羽叔姪承繼其業，劉邦追隨其後。綜觀朝代更替之際，發難者所面對的挑戰是最大的，故成功者稀，正因陳涉、項氏掃平秦軍部分主力，故後繼之劉邦得以減少威脅。對此，太史公言道：「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殫，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sup>23</sup> 又於〈陳涉世家〉指出陳涉首先發難，高祖亦感念其功。言道：「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sup>24</sup> 甚至對於對手項羽烏江自刎後，劉邦還以魯公之禮葬之，並為之發喪。<sup>25</sup> 由劉邦建國後，追念陳涉、項羽的作法，可見出劉邦深知陳、項抗暴行動，削弱了秦的勢力，為劉邦興漢奠定基礎。

其三，秦行暴政，違反歷史變遷法則，為漢之建立提供契機。前已指出太史公提出的「忠」、「敬」、「文」的循環原則或「質」、「文」更迭原則。順此原則，太史公認為秦繼周而起，應以「忠」（「質」）救文，卻反行苛政，漢救正秦政之失，甚得民心，故能繼周之後，順歷史之法則而行。太史公言道：「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sup>26</sup> 正因秦違歷史變遷的通則，給予劉邦有利時機，而劉邦以「忠」（「質」）救文敝，故漢初表現出質樸少文的時代風氣。

其四，項羽不知以仁德救正秦政暴虐之失，反行暴政，提供劉邦得民心的機會。太史公以「一張一弛，文武之道」<sup>27</sup> 的觀點評論劉、項的作法。秦朝苛政，致使民不聊生，而劉邦

<sup>21</sup> 《尚書引義》〈武成〉卷四，《船山全書》第2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頁335。

<sup>22</sup> 太史公曰：「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秦楚之際月表序〉，《史記會注考證》，卷16，總頁307-308。

<sup>23</sup>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史記會注考證》，卷16，總頁307。

<sup>24</sup> 〈陳涉世家〉，《史記會注考證》，卷48，總頁771。

<sup>25</sup> 〈項羽本紀〉，《史記會注考證》，卷7，總頁158。

<sup>26</sup> 〈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史記會注考證》，卷8，總頁182。

<sup>27</sup> 此語出自《禮記》〈雜記〉中孔子的說法。

行約法三章，正可救正此弊，項羽不明此理，依舊行暴政，故此無法得民心。項羽能以短短三年率領五諸侯諸侯滅秦，自任西楚霸王，分封天下，甚至抗逆楚懷王之命，私自將劉邦封於漢中；在志得意滿之際，項羽的自負與剛愎，背約逐義帝，行剛猛之政，欲以力爭天下，自無法救正秦政之失，反違背時代潮流。反觀劉邦能忍一時之忿，的群賢群策群力的輔佐，屢敗屢戰，終得天下。對此，太史公論道：「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又曰：「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寐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sup>28</sup>

## 參、英雄造時勢——劉邦與群眾意識

關於劉邦何以能聚集三傑等出色人才，建立輝煌功業，此處擬以梁啟超先生所提出「首出的人格者」與「群眾的人格者」此二概念來說明之。所謂「首出的人格者」是指一人或一群人的作為影響著某個時代的發展，梁啟超先生指出此類「首出的人格者」並非道德人物，而是最能掌握時代脈動且依此趨勢而行事者。彼言道：「所謂大人物者，不問其為善人、惡人，其所作事業為功為罪，要之其人總為當時此地一社會——最少是該社會中一有力之階級或黨派——中之最能深入社會閭奧，而與該社會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應作用，極緊張而迅速。」<sup>29</sup>

至於「群眾的人格者」則是指某個時代各社會成員的願望、價值等，然而個人的願望、價值會因某些因素而形成集體意識。梁氏言道：「社會多數人或為積極的同感，或為消極的盲從，而個人之特性，浸假遂便為當時此地之民眾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團性或時代性。」<sup>30</sup>

梁氏注意到社會領袖與群眾意識間的關聯性。某個或某些社會領袖其觀念背後，有著龐大的群眾意識作為基礎，而模糊的群眾意識又常經由領袖人物將其理念加以實現。彼言道：「表面上，雖若一切史蹟純為彼一人或數人活動之結果，然不能謂無多數人的意識在其背後。實則此一人或數人之個性，漸次侵入或鑄入於全社會而易其形與質。」<sup>31</sup>又曰：「所謂『群眾的人格者』，...實際上其所表顯者，已另為一之集團性或時代性，而與各自之個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謂『領袖』者以指導其趨向執行其意思，然後此群眾人格乃得實現。」<sup>32</sup>

<sup>28</sup> 〈項羽本紀〉「太史公曰」，《史記會注考證》，卷7，總頁158-159。

<sup>29</sup> 《中國歷史研究法·史蹟之論次》，頁165。

<sup>30</sup> 《中國歷史研究法·史蹟之論次》，頁164。

<sup>31</sup> 《中國歷史研究法·史蹟之論次》，頁164。

<sup>32</sup> 《中國歷史研究法·史蹟之論次》，頁164。

梁氏並關注何以社會領袖與群眾意識會產生如此的關聯性。彼言道：「吾以為歷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於一個人之個性？」<sup>33</sup>若將此問題套在秦末漢初，便可形成這樣的問題，即劉邦何以能成為當時下層官吏及百姓的領袖？

關於劉邦何以能反映當時的時代性，深究後發現有兩大要件，一是劉邦出身民間，對民間的生活認識較深，所來往者如蕭何、曹參亦為地方基層官員對基層事務較為熟悉。正因深察民情，故能以解決民苦為號召，推翻秦暴政，廢除苛法，而深得百姓支持。反觀項羽，出身將門之後，對民情的瞭解不及劉邦深切，故而無法見出百姓受秦法桎梏之苦，反行軍政厲法。

其次，若僅有恤民之心仍有不足，尚需配合個人優異的智力及高明的人際能力，方能對現實有所覺知，能掌握時勢並廣聚人脈。以下將就劉邦個人的特殊才能進行分析。

## 肆、劉邦的政治天才

關於劉邦成功原因，除了前所指出楊燕起先生認為劉邦得天下實屬僥倖，為乘勢而起者。此外，亦有不少人受李宗吾《厚黑學》影響，強調劉邦的流氓特質。該書指出：「劉邦天資既高，學歷又深，把流俗所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一一打破，又把禮義廉恥，掃除淨盡，所以能夠平蕩群雄，統一海內。一直經過了四百幾十年，他那厚黑的餘氣，方才消滅，漢家的系統，於是乎才斷絕了。」<sup>34</sup>此說法強調劉邦面厚心黑的負面人格特質，簡言之，即流氓皇帝是也。但臉皮厚、心黑，果真是當帝王的必要條件嗎？歷代面厚、心黑者不計其數，何以僅少數人登上九五之位？個人以為此說法未免太粗疏。依照李宗吾先生的說法，認為劉邦本人無啥本事，有的只是無賴本性，但深究劉邦的性格與才能，實有其值得稱道處。

賴漢屏先生認為：「能另創新朝者，定有過人之才識，單靠流氓手段，雄猜陰險是絕對不能成氣候的。劉邦之所以最終成為漢高祖，開西漢二百年基業，自有其所難及的長處。」<sup>35</sup>

至於劉邦過人之處為何？宋代陳亮嘗言道：「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sup>36</sup>陳亮認為，在「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sup>37</sup>的情況下，劉氏之有天下，在時代動蕩需要才德出眾之士

<sup>33</sup> 《中國歷史研究法·史蹟之論次》，頁164。

<sup>34</sup> 《厚黑學》，臺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頁16。

<sup>35</sup> 《史記評賞》，頁32。

<sup>36</sup> 《陳亮集·問答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年），卷之三，頁32-33。

<sup>37</sup> 《陳亮集·問答上》，頁32。



掃平四海，劉邦以本身卓越才能及德義，得以在群雄環伺下，脫穎而出，得到百姓之認同。此說法較厚黑說、運氣說更具說服力。

然而陳亮的說法，亦有值得商榷處。如陳亮所云：「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sup>38</sup>此論點尚需細部釐清。若說劉邦的德義與項羽相比，更宜君天下，則無爭議，或因劉邦起於民間，能體會民間疾苦。然而將劉邦與湯武之心並稱，在表面或許相類，然深究之則有真、偽的分別。湯武之心，真德義也，全出於公心；劉邦之心，偽德義也，本於私心。故須深入分析，不可憑表象等同視之。

至於前所引陳亮所言「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其中的「智」與「力」乃得天下的兩大要素，劉邵《人物志》<sup>39</sup>稱之為「英才」、「雄才」的兩大特質，並指出二者兼備方為英雄。英才的特質是聰能謀始，明能見機；雄才則是以力服眾，以勇排難，即膽力是也。若一身兼具英才、雄才兩種能力，且質量特出，方能以英雄的風姿成為眾人領袖，吸引天下的英才與雄才的依附，進而成就大業。<sup>40</sup>劉邵進一步指出，即使均稱為英雄，然其英才、雄才的比重有別。若本身英才較少，則英才依附者少；反之雄才少，則所網羅之雄才亦寡。故《人物志》言道：「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

依劉邵的分析，劉邦本身英才成分高於雄才，而英才的重要特質便是聰明，即前述所稱聰能謀始，明能見機，故劉邦能於時勢變化中，以自身的條件，加上英才的輔助，方能掌握變化契機。而此正說明，時勢為眾人所共有，何以唯一、二人能乘勢而起，關鍵在於眾人無法察勢於未變之前，唯有高識者能覺察之。故船山言道：「國家之勢，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於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於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sup>41</sup>一張一弛乃時代變化的核心原則，善於掌握時機者，能於將變之際，順勢而為，而非至不得不變之際才決心變革。劉邦所以能躍登歷史舞臺，與善於知幾有關。

<sup>38</sup> 《陳亮集·問答上》，頁33。

<sup>39</sup> 本文所採版本為劉邵撰、蔡崇名校注，《新編人物志》（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0年）。關於劉邵的「邵」，蔡崇名先生指出歷代有「邵」、「劭」、「邵」三種寫法，並認為當以「邵」為當。理由是《說文》云：「邵，高也」，而「劭」作勉力解，「邵」為地名，「邵，高也」與劉氏之字「孔才」，義較相符。《新編人物志》，頁14-15。考察名與字的關聯性，蔡氏的說法極具說服力，故全文採用其論點，寫作劉邵。此外，文中關於〈英雄〉篇的引文見於《新編人物志》，頁229-245，為使行文簡潔，以下引文不另標出處。

<sup>40</sup> 劉邵云：「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又曰：「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

<sup>41</sup> 《宋論》（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6，〈論神宗〉三，頁118。

張良、韓信嘗稱高祖知兵法與御將能力是天生的，<sup>42</sup>班固以劉邦未稱帝前出案的種種靈瑞符應，強調高祖奉天承運，有帝王之命。<sup>43</sup>此二說法，於今觀之，不免有迷信色彩。要如何解釋劉邦所具有的特殊能力，方可免除迷信的論調？今人牟宗三先生的觀點，可化解此難題。牟氏以劉邦獨特的人格特質，將太史公所載劉邦親口說出的「天命」，甚至張良、韓信所說的「天授」，均理解為「天才」，將劉邦視為一政治天才。

牟氏逕從秦朝時代生命的枯竭，提出「天才時代」的來臨。彼言道：「劉邦以一平民統一海內，開歷史上之創例，不能不說其為一能盡氣之天才，而且成為一個典型。在天才的盡氣上，及其成功，便謂之曰『天命』。人民亦名之曰真命天子。」「天命二字，劉邦親自說出。…甚有衷氣，亦有無限感慨，故無虛詐。」<sup>44</sup>牟氏的天才說，異於陳亮由才能、德義論劉邦，避免前所指出德義說的含糊處。

牟氏一反後人對劉邦的鄙視，<sup>45</sup>認為項羽之生命格局不及劉邦，強調劉邦生命表現出的「豁達大度」。<sup>46</sup>牟氏對太史公「豁達大度」一詞作出深刻解釋，將「豁達大度」理解為劉邦生命涵具不成套的靈動生機，且外顯出無所滯隘的耀眼神采與蓋世氣象。牟氏云：「劉邦之豁達大度自是屬於英雄氣質的，所謂天才也。而此種氣質胥由其儀態以及現實生活之風姿處表現。…其氣象足以蓋世，其光彩足以照人，此亦天授，非可強而致。」「天才之表現之風姿，乃混沌中之精英也。…故其機常活而不滯，其氣常盛而不衰。」「觀之似不成套，而其格之高即在其不成套。」牟氏認為項羽與劉邦相較，項羽的限制在於生命的「沾滯與吝嗇」，「既沾滯矣，則不能化物；既吝嗇矣，則為物移。」<sup>47</sup>

牟氏又進一步區分天才的自然風姿與後天刻意表現的姿態不同，其中的差別在於，自然與不自然，二者判若天壤。牟氏言道：「強而上騰，則費力不自然，不可以懾服人，所謂矜持而亢也。天授者則其健旺之生命，植根深，故發越高；充其量，故沛然莫之能禦。」又言道：

<sup>42</sup> 〈留侯世家〉：「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者，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史記會注考證》，卷 55，總頁 804。〈淮陰侯列傳〉：「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史記會注考證》，卷 92，總頁 1073。

<sup>43</sup> 班固曰：「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嫗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睹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云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敘傳第七十上〉，《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 年）卷 100 上，頁 4211-4212。

<sup>44</sup> 《歷史哲學》，第三部第三章，臺北，臺灣學生書局，臺 7 版，1988 年 8 月，頁 194。

<sup>45</sup> 牟氏言道：「司馬遷作〈項羽本紀〉，文章生動，對於西楚霸王寄以同情之感，而於〈高祖本紀〉，則不甚鋪張揚厲。人遂鄙劉邦而厚項羽。論者又常以朱元璋比劉邦：平民創帝業一也，誅戮功臣二也，陰險殘刻三也。以此推彼，益多可憎。實則皆皮相之見，不可為訓。朱元璋別是一格，自有其心理之變態。」《歷史哲學》，頁 157-158。

<sup>46</sup> 《歷史哲學》，頁 158。

<sup>47</sup> 《歷史哲學》，頁 159。

「在天才前，天資與天資比，有高低，有強弱。毫釐之差，便有不及。馳騁角逐，所爭只在呼吸間，不及即是不及，決無可以虛假矜亢而冒充者。」<sup>48</sup>

劉邦本身除具備英雄特質及天賦的豁達大度外，尚有《人物志》所稱的「中和」特質。雖然劉邵是就聖人而論中和之質，但劉邦在管理方式上的表現，卻與劉邵所言相近，但劉邦並非聖人，其中和之質是英雄式的，不同於聖人的中和。劉邵論中和言道：「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又曰：「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質而不縵，文而不績；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為節。」<sup>49</sup>

若吾人以為劉邦一無所能，全賴三傑之力而定天下，則無法理解張良、韓信的「天授」說，亦無法解釋三傑何以甘願臣服劉邦，為之效力。透過「中和」說，便可理解劉邦獨特的領導方式，本身不顯其能，將賢才放在恰當的位置，並充分授權，適當地調合眾長。看似一無所為，卻暗合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理想。此理想包含兩層涵義，一層是君王本身不強調其才智、能力，而表現出平淡沖和的氣象，提供人才發揮的舞臺；另層涵義則是指君王本身沒有過多干預，讓人才充分發揮長才。如此看似人君一無所為，但卻無所不為，人君去除有心有為，成就「無為而無不為」。

作為領導者，文武全才並非要件，很可能自身之文韜、武略反而成為障蔽，長於文韜之主，亦自恃其長而不能善用智士；善於武略之主，亦恃勇而驕不能善用統帥之才。如三國曹操以謀略擅長，故雖有軍師荀彧，卻不能善終，郭嘉、賈詡諸人不過揣度獻策，無法如孔明獨當大任；項羽以武略自恃，故有韓信而不能用，連忠心之鍾離昧亦曾遭忌。然是否文、武平庸者即為明主？非也。若文、武平庸，焉能識才而善任，又如何能知英才、雄才謀略、行事之奇？

反觀劉邦本身雖為英雄，但卻表現出一無所長，此反成為劉邦領導的長處。既然張良、蕭何、韓信、陳平均為難得人才，劉邦所要做的就是提供賢才發揮的機會，將人才放在恰當位置，蕭何重其內政，張良重其整體謀策，韓信用其統帥長才，陳平善於應變。進而充分授權，不加干預，使諸賢充分發揮，方能成就石破天驚的開國事功，而此便是劉邦英雄式中和特質的充分展現。

## 伍、漢初三傑鼎立大局，韓信效忠增添利基

正因劉邦具英雄式的中和之質，故能識人、用人。班固嘗指出劉邦興業的五大主因，其

<sup>48</sup> 《歷史哲學》，頁 162

<sup>49</sup> 此二段分別見於《人物志》〈九徵〉、〈體別〉，頁 21、57。

一即「知人善任使」<sup>50</sup>，並就細論劉邦如何知人善任，包括善於聽受、從諫如流、即知即行、不計出身。<sup>51</sup>正因劉邦善用人，故能得眾星拱月，不僅三傑為帝國建立鋼骨，尚有彭越、樊噲、周勃、英布、曹參、陳平、酈食其等文臣、武將為鋼骨增添血肉。

軍事部分，由韓信領軍，曹參等人配合，完成任務；文事部分，由張良定遠謀，陳平出奇計，酈食其發揮外交長才，文武合作無間。反觀項羽，文、武僅靠范增、鍾離昧及項氏宗族等少數人，楚漢之爭前期因能充分信任范增、鍾離昧等重臣，故建立西楚帝國；然到了楚漢之爭後期，項羽本身猜忌的性格，遭陳平以離間計破壞君臣關係，情勢迅速走下坡。劉、項勢力消長，分明可見。

雖然牟氏強調劉邦的政治天賦，表現出不成套的靈動風姿，但牟氏認為若僅賴此條件，仍無法制天下，尚須依賴能建制之人輔佐，以建立客觀系統。牟氏云：「劉邦並無一定系統，而其系統在張良，在蕭何，在韓信。」此正呼應〈高祖本紀〉劉邦與臣下論得天下之因。當高起與王陵將得天下之原因歸結於劉邦「與天下同利」，此勝於項羽「妒賢嫉能」與吝於封賞。但劉邦回應是：「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即不吝分封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能重用賢才，決策方面靠張良提出具體有效策略，內政方面賴蕭何定制運作，軍事方面借重韓信的軍事謀略與行動。<sup>52</sup>

三傑對劉邦而言，使劉邦的領導天賦得以客觀系統化，以全面性的軍事與政治優勢，擊敗項羽單方面的勇武作為。表面看似爭天下多賴三傑之功，然無劉邦之高智及獨特的領導統御能力，焉能見三傑之特出處，且使三傑適當發揮其長才？正因受劉邦深知且重用，加上三傑本身的長才，彼此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牟氏見解的獨特處在於，將劉邦與三傑並舉，故能一方面見出劉邦得三傑之助而得以系統化，另一方面見出三傑因與劉邦合作，方能大顯長才。牟氏云：「張良與高祖相得而彰智，蕭何與高祖相得而成事。智之靈所以運事，事之局所以定世。」<sup>53</sup>其中，蕭何助劉邦成事是指：

<sup>50</sup> 班固曰：「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漢書》〈敘傳第七十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卷100上，總頁4211。

<sup>51</sup> 班固云：「加之以信誠好謀，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陳，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漢書》〈敘傳第七十上〉，《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卷100上，總頁4211。

<sup>52</sup>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史記》，卷8，總頁176。

<sup>53</sup> 《歷史哲學》，頁232。

「為法化一，足以堅穩一代之大局」。<sup>54</sup>劉邦的充分授權，使得張良的智謀與蕭何的行政長才，為漢家定立長遠的謀略及制度。

關於張良對漢立國之功，雖然清·湯諧指出張良畢生之志在為韓報仇，藉高祖之力以成其志。<sup>55</sup>但楚漢相爭五年間，張良的出謀畫策關係著漢營的命運。其中，較重大的策略有六項：1、鴻門宴解劉邦之危，2、項羽分封天下後，使項王擴增劉邦封地，並鬆懈對漢王之戒備，使漢軍神鬼不覺地出漢中。3、在劉邦彭城大敗之際，提出重用韓信、英布、彭越三人開新局之計策。4、又勸劉邦打消分封六國之後，避免勢力分散。5、與陳平暗示劉邦封韓信為齊王，安定韓信之心。6、垓下之役勸劉邦以封地之賞，召韓信、彭越軍相助。此數策均使劉邦在危難之際，轉危為安。

至於蕭何對漢立國之功，漢高稱其功在於：「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sup>56</sup>。太史公於〈自序〉亦指出：「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意即蕭何安頓關中，既補糧輸軍，又安輔百姓，使劉邦既無後顧之憂，又能得到充分補給。除此大功外，另一項更大的貢獻便是推薦韓信。劉邦集團最欠缺的便是統帥之才，樊噲、曹參、周勃雖能帶兵，卻不善整體戰略，僅能奉命行事，若無韓信赫赫戰功，恐天下未必歸於劉氏。蕭何第三大貢獻便是入咸陽，收秦御史律令圖書，遂知天下要塞、人口、稅收、法律等行政、地理資訊，對漢家爭天下、定天下提供極佳的參考資料。

最後談到韓信，漢高嘗稱讚其功業：「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sup>57</sup>而蕭何則視韓信為國士<sup>58</sup>，並非一般攻城掠地的武將，並指出劉邦欲爭天下，非韓信不能成之。何以蕭何如此看重韓信？從兩方面便可見出，一是「漢中對」，一是高明的軍事謀略。

「漢中對」明確分析兩方的情勢，指出項羽僅有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不捨得封賞；在重大決策上有極大疏失，如定都、背義帝、分封不公；此外更大的限制在於殘暴，失天下民心。既然項羽之情勢如此，韓信建議劉邦，遠程之計在於反項羽之道而行，包括重用雄才、分封功臣、興義兵；近程之計，滅三秦，出漢中。韓信分析劉邦得民心，且受項羽不公的待遇，加上三秦不得民心，而漢軍多思東歸，若能乘勢興兵，定能一舉出漢中。由整個「漢中對」可見出韓信亦有政治長才，如三國孔明未出茅廬便能預知三分天下，故朱熹將此對策與

<sup>54</sup> 《歷史哲學》，頁 234。

<sup>55</sup> 《史記半解》湯諧云：「留侯一生所用全是高帝一人，其餘所用諸人，皆用高帝以用之也。蓋留侯本念為韓，而韓既不可復興，幸遇漢高天授，因藉其力以報君父累世之仇。既藉漢力以報韓仇，自當矢靖共以昌漢業，其經濟作用皆從忠孝大節生來，此留侯本領所以高出一時諸公之上，而高帝反為所用也。」《歷代名家評史記》（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0 年），頁 612。

<sup>56</sup> 《史記》〈高祖本紀〉，《史記會注考證》，卷 8，總頁 176。

<sup>57</sup> 《史記》〈高祖本紀〉，《史記會注考證》，卷 8，總頁 176。

<sup>58</sup> 《史記》〈淮陰侯列傳〉載道：「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史記會注考證》，卷 96，總頁 1065。

「隆中對」相提並論。<sup>59</sup>

至於韓信出色的軍事謀略，彼破楚於京、索間，破魏、下代、滅趙、下燕、破齊及陔下之戰。其中最能顯高明戰略者為以聲東擊西，木罌渡河的破魏之戰；<sup>60</sup>及破趙的井陘之戰，利用情報蒐集，運用伏兵，加上背水陣，以數萬兵大勝趙軍二十萬。<sup>61</sup>至於破齊的濰水之戰，韓信在精兵為劉邦調走後，以沙袋降低濰水水位，並以弱示龍且，使龍且生輕敵之心，於楚軍半渡之際，利用水勢擊潰龍且軍。<sup>62</sup>至於最後的垓下之戰，更是最後決勝關鑑，此役仍由韓信統籌，利用陣勢及楚歌行心理戰，大敗楚軍。<sup>63</sup>韓信在軍事上，善於謀略，並善於帶兵，即使數量不多，未經嚴格訓練的士卒，在韓信高明的策略下，往往能出奇制勝，以寡擊眾。

韓信對漢立國的大功，除了上述「漢中對」為漢軍提出大方略，幾次重要戰役擴大了漢軍領地，相對亦削弱楚軍勢力。此外，韓信的一項決定，對劉邦有著深遠影響，即韓信不肯背漢。若韓信聽從武涉、蒯通游說，叛漢自立，恐天下未必為劉邦所有，以韓信之才，據齊之要地，三強鼎立，勝負未可知矣。

在三傑盡心竭力發揮長才，並全意效忠下，使劉邦屢屢在風雨飄搖之際，轉危為安，使情勢大逆轉而漸趨上風，取得最後勝利。此實為劉邦與三傑，加上集團眾人之力配合下，屢敗屢戰，堅持到最後的成果。

## 陸、如何評斷定天下後的表現

劉邦定天下後的表現，有三件大事值得探討，即定都問題、立太子事件與對待功臣的方式。以定都一事而言，雖然高祖意在洛陽，不聽婁敬之建議，然在張良理性溫和勸服下，確定定都關中。<sup>64</sup>在立太子一事，高祖以私情欲改立如意，然在張良安排下，見商山四皓出山輔助劉盈，<sup>65</sup>遂放棄個人私情，仍以劉盈為太子。無論定都或立太子事件，高祖初始皆有強烈個人主張，最後在張良直接、間接勸諫下，放棄私意，為國家作長遠考慮。

劉邦定天下後，較受爭議的是對待功臣的態度。韓信、彭越被誅殺，連極受信賴的蕭何亦嘗下獄，關係至親的樊噲亦差點命喪黃泉。立國之初，迫害功臣，此雖非劉邦才有的行徑，

<sup>59</sup> 朱子云：「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編策編為一卷。」《朱子語類》第五冊，《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卷135，頁4195。

<sup>60</sup> 見《史記》〈淮陰侯列傳〉，《史記會注考證》，卷96，總頁1066。

<sup>61</sup> 《史記》〈淮陰侯列傳〉，《史記會注考證》，卷96，總頁1067。

<sup>62</sup> 《史記》〈淮陰侯列傳〉，《史記會注考證》，卷96，頁1069-1070。

<sup>63</sup> 見於《史記》〈高祖本紀〉，《史記會注考證》，卷8，總頁175。

<sup>64</sup>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乃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史記會注考證》，卷8，總頁176。

<sup>65</sup> 見於《史記》〈留侯世家〉，《史記會注考證》，卷25，總頁809。

歷代帝王多有此例。歸根究底，實是帝王私心所致，劉邦亦然。既然劉邦九死一生好不容易爭得了天下，當然不希望喪失大權。眾功臣位高權重，自然造成劉邦的不安。對劉邦而言，文臣、武將相較，自以武將造成的威脅較大，更何況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韓信。劉邦滅項羽後，頭一件事，便急將韓信由齊遷楚；不多時，又採陳平偽遊雲夢，奪其兵權，貶為淮陰侯。貶官後的韓信，仍不改豪氣，「多多益善」的豪語，更讓劉邦不安，埋下日後殺機。<sup>66</sup>

在眾文臣中，當然以居功厥偉的蕭何最具威脅，主要是蕭何甚得民心。劉邦採三次政治性試探，幸而蕭何的旁人相助，化險為夷。然卻又因為民請願，奏請開放上林苑而下獄，後雖被釋放，<sup>67</sup>但整個事件可見出劉邦對蕭何的試探與猜忌。

關於定天下後，劉邦對待韓信、蕭何的方式，是否因劉邦本身才能不及，故而加以迫害？對於此，答案是否定的。可從劉邦對蕭何的試探，劉邦私入韓營奪其帥印，及韓信稱劉邦善於將將，在在可見出，劉邦對臣屬有其高明的駕馭手腕。就領導英才、雄才的能力而言，劉邦實屬高明的領導者，即牟宗三先生所稱的政治天才。故無法狹隘的嫉才之心來解釋劉邦對待功臣的行徑。個人以為，劉邦（含呂后）迫害功臣，確實與猜忌之心有關，但此猜忌之心，並非基於一己的面子，深究之，實為後代子孫作安排。就劉邦本身而言，自能駕馭這些功臣，然對年幼的繼位者而言，未必能得功臣們全力效忠，為防此弊，故而採取試探或誅除的手段對待功臣。

就劉邦定天下後的種種表現，可見出劉邦有著濃厚的家天下思想，種種作為皆欲使劉氏家族能長久掌握此政權；為達此目的，放棄了個人私意、私情，盡可能建立長治久安的制度。至於對功臣的試探、誅殺亦是在此立意下進行的。唯有從家天下的向度，方能為劉邦定天下後的種種作為，找到完整而合理的解釋。

## 柒、結論

太史公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撰寫秦末漢初這段歷史，探討劉邦如何以一介平民，在短晚五年間，便能代秦而興？這是史家從三代至秦朝，思索朝代興革所產生的疑問。太史公明確區隔漢與三代與秦立國因素的分別，進而從秦楚之際的時代趨勢，及劉邦與項羽及其集團的人物特質及重要作為，最後提出劉邦所以建立漢朝，一方面得力於時勢，並善於掌握契機；另方面是得英才、雄才相助，群策群力。

劉邦建立漢朝，對整個歷史有著重大影響，他開啟了平民革命建立新朝的範例，整個中國歷史發展亦由過去封建諸侯得天下，轉出平民或有官職者得天下的模式。此平民立國典型，與以德立國的商、周，及以武立國的秦朝相較，其中不變的原則是強大的軍事實力與天下民

<sup>66</sup> 事見《史記》〈淮陰侯列傳〉，《史記會注考證》，卷 96，總頁 1072-1073。

<sup>67</sup> 事見《史記》〈蕭相國世家〉，《史記會注考證》，卷 53，總頁 795-797。

心向背。

對於劉邦形象的掌握，可透過《史記》的記載，將各方面資料像拼圖一樣，一片片拼出一完整圖像，然此僅能得出表象；尚需掌握劉邦的神韻。然而，對人物形神的把握，難免受限主觀意識，完全客觀是不可能，只能盡可能作到客觀。如何避免主觀成分過重，個人以為可採中庸之道為準的，避免太過與不及，過度美化或醜化人物，皆無法相應地對人物進行理解。

至於如何評價劉邦，個人以為應盡量選擇相應的標準，若依據聖人君子嚴格的道德標準來評論，則明顯見出劉邦在道德方面的不足，而其他方面特質亦無法照見。若純從事功價值來評斷，因劉邦是成功者，很容易舉出致勝原因；然而因劉邦本身不若曹操、李世民才氣逼人，形象鮮明，後世解釋者易流於從劉邦得三傑相助，僥倖成功來解釋。

深入考察太史公對劉邦的評論，一方面認為劉邦既無商湯、周文王的道德修養，亦無秦始皇過人的膽識，甚至以「無賴」來表現劉邦不居小節，缺乏人文素養的性格及作為；另一方面卻從劉邦藉由自身的政治天份，勇敢地掌握時機，發揮英雄式的中和特質，並站在歷史評價的立場，將劉邦放入歷史發展的脈絡，指出劉邦如何乘勢而起，以個人加上集團的力量，躍登歷史舞臺。

本文便由此探討《史記》關於劉邦形象的描述及評價，以見出太史公如何記載並評論自身所處的漢代史。太史公對自身所處時代的描述與評論，為吾人理解並評論現代史，提供了極佳的典範。



## 參考文獻

### 一、專書

#### (一) 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1986）。**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1991）。**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
- (魏)劉劭撰、蔡崇名校注（2000）。**新編人物志**。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
- (清)王船山（1964）。**宋論**。北京：中華書局。
- (清)王船山（1996）。**尚書引義，船山全書（二）**。長沙：嶽麓書社。
- (宋)陳亮（1983）。**陳亮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
- (宋)黎靖德（2002年）。**朱子語類**第5冊、**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清)湯諧（2000）。**史記半解**，清康熙慎餘堂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 (二) 近人論著

- 卜憲群（2003）。**秦漢官僚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王志剛（1900）。**劉邦：弱勢贏家的99加1韜略**。臺北：正展出版社。
- 司馬遼太郎著、鍾憲譯（2005）。**項羽對劉邦：楚漢雙雄爭霸史（上）（下）**。臺北：遠流出版社。
- 安作璋、孟祥才（1988）。**劉邦評傳**。濟南：齊魯書社。
- 牟宗三（1988）。**歷史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李偉（2001）。**弱勢大贏家：劉邦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臺北：詠春圖書。
- 李宗吾（1993）。**厚黑學**。臺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季燁（2003）。**劉邦**。臺北：知書房出版社。
- 孟祥才（2003）。**先秦秦漢史論**。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
- 孟慶華等（2000）。**劉邦評論**。江蘇：「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
- 林聰舜（2003）。**史記的人物世界**。臺北：三民書局，。
- 林劍鳴（1992）。**新編秦漢史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 馬非百（1986）。**秦集史**。臺北：弘文館出版社。
- 秦漢唐（2005）。**楚漢爭霸—劉邦用人方略**。臺北：文經閣出版社。
- 孫文聖（2006）。**劉邦**。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
- 黃中業（2006）。**漢高祖劉邦傳/毛澤東評點的帝王大傳**。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 徐進興（1991）。**關中對楚漢之爭成敗的影響**。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梁啟超（1984）。**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書局。
- 陳文德（2005）。**弱勢大贏家：劉邦大傳**。臺北：遠流出版社。

- 張鳳洪（2003）。大風之歌（漢高祖劉邦）。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 張大可、徐日輝（2002）。張良蕭何韓信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張傳璽（1959）。秦漢問題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開楊（1985）。秦末農民戰爭史略。北京：新華書局。
- 楊燕起（1996）。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1990）。歷代名家評史記。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 詹士模（2003）。反秦集團滅秦與分裂戰爭成敗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論，未出版，嘉義市。
- 翟文明（2001）。劉邦圖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賴漢屏（2000）。史記評賞。臺北：三民書局。

## 二、期刊論文

- 卜憲群（1995）。秦制、楚制與漢制。中國史研究，1，45-53。
- 王仲孚（1983）。論楚漢之爭的成敗關鍵。國魂月刊，456，54-56。
- 王文顏（1989）。司馬遷筆下的高祖形象。孔孟月刊，27(12)，27-35。
- 王燕（1998）。從劉邦與蕭何的關係看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濱州教育學院學報，1，32-33。
- 田靜（1994）。秦統一後的六國貴族。歷史教學，3，37-39。
- 朱紹侯（1958）。關於秦末三十萬戍守北邊國防軍的下落問題。史學月刊，4，10-11。
- 汪榮祖（2002）。楚霸王的興亡。歷史月刊，177，43-48。
- 李威熊（1978）。創業的典範—劉邦。幼獅月刊，48(6)，13-17。
- 李開元（1999）。前漢初年軍功受益階層的成立。史學雜誌，108，1017-1890。
- 呂春盛（1991）。試論秦末六國的復國意識。史原，18，1-28。
- 阮芝生（1981）。論留侯與三略。食貨月刊，復刊11(2)、11(3)，54-71。
- 宋公文、何曉明（1983）。略論劉邦的謀士群。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02-108。
- 肖振宇（1999）。試談韓信被殺的自身原因。張家口師專學報，1，35-37。
- 肖振宇、張永華（2002）。劉邦統御之術述評。張家口師專學報，1，17-20。
- 芮和蒸（1988）。漢高祖完成帝業的分析研究。收於王壽南等撰，政治史，臺北：漢苑出版社。
- 段莉芬（1994）。《史記》人物論：高祖劉邦。建國學報，13，23-35。
- 胡安蓮（1998）。司馬遷筆下的漢高祖形象。南都學壇，18，57-59。
- 許倬雲（1980）。由新出簡牘所見秦漢社會。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51(2)，217-232。
- 韋天富（1996）。論劉邦成功的七個因素。廣西大學學報，5，64-69。
- 孫永忠（1985）。《史記·高祖本紀》中四篇「告諭」析評。輔仁國文學報，13，97-119。
- 徐勇、黃樸民（1994）。論韓信「漢中對」的戰略思想及其歷史地位。人文雜誌，4，76-79。
- 徐連達（1992）。秦末社會矛盾再探討—兼評秦楚之際的地方差異性。許昌師範學報，1，26-32。
- 馬植傑（1999）。韓信新論。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9-33。
- 郝建平（1996）。人才與事業成敗—劉邦用人特色淺析。陽山學刊，3，37-44。
- 夏子賢（1994）。略論秦王朝的覆滅。安慶師範學院社會科學學報，2，1-8。
- 崔向東（1996）。論劉邦項羽的性格及對成敗的影響。錦州師範學院學報，1，32-36。

- 陳玉屏（1995）。劉邦與異姓諸侯王。《西南民族學院學報》，3，8-15。
- 陳瑾（1997）。自我實現的內在人格——論《史記》中劉邦形象的審美意趣。《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6，25-28。
- 陳蘭村、張金菊（1995）。論《史記》漢初三傑形象的典型意義。《浙江社會科學》，2，66-70。
- 閔躍進（1997）。項羽敗因淺析。《婁底師專學報》，1，70-72。
- 郭秀琦（1996）。從戰國時期地主階級人生價值觀看劉邦與韓信的關係。《陰山學刊》，3，45-50。
- 郭化民（1958）。試論有關秦末農民大起義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7，27-33。
- 郭興文（1988）。秦亡原因新探。《文博》，2，14-21。
- 曹家齊（1993）。劉邦分封與西漢統一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46-49。
- 曹家齊（1996）。劉邦布衣集團與西漢政權的建立。《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1-95。
- 張建國（1996）。試析漢初「約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談「二年律令」與蕭何關係。《法學研究》，1，154-160。
- 張濤（2001）。秦漢騎兵起源及其發展新探。《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1(2)，58-71。
- 張傳璽（1954）。項羽論評。《文史哲》，10，49-53。
- 楊維、任澤全（1974）。楚漢戰爭試析。《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1-66。
- 趙文潤、鄭世敏（1996）。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韓信與蕭何之比較研究。《漢中師範學院學報》，3，42-49。
- 趙文潤（1982）。重評劉邦、項羽的成敗原因及是非功過。《人文雜誌》，6，86-90。
- 趙文靜（1994）。韓信死因新探。《錦州師範學院學報》，2，80-82。
- 廖伯源（1982）。試從爵邑制度論楚漢相爭之勝負。《東吳文史學報》，4，71-74。
- 劉正文（1997）。張良功成不居探因。《漢中師範學院學報》，4，31-45。
- 劉昌安（1995）。論張良人生擇向的文化意義。《漢中師範學院學報》，4，42-49。
- 劉文瑞（1990）。征服與反抗——略論秦王朝區域文化衝突。《文博》，5，52-61。
- 劉雪豐（1991）。秦末農民戰爭中的懷王心。《文史雜誌》，1，19-20。
- 蔡行發（1986）。試談楚漢戰爭。《史學月刊》，5，。
- 韓雪風（1994）。劉邦用人之道研究。《史學研究》，1，70-72。
- 譚潤生（1997）。讀《史記》——韓信的榮與辱。《中國語文》，485，31-36。
- 譚潤生（1997）。讀《史記》——韓信的得與失。《中國語文》，486，28-36。

## 作者簡介

楊自平，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Tzu-ping Ya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收稿日期：95.11.20

修正日期：96.12.10

接受日期：96.12.18

# An Analysis of Liu Pang's Exploits and his Historical Orientation Based on Su Ma-chien's *Shi-ji*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Tzu-ping Y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aishih Kung's evaluation of Liu Pang, and his explanation of how the Liu Pang collective founded the Han Dynasty. Taishih Kung thought that the Han Dynasty wa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wo factors, "trend" and "hero." By looking closely at the historical path that begins with the Qin Dynasty's downfall and ends Chen Sheng's revolution and Hsiang Yu's hegemony, Taishih Kung perceived that Liu Pang had followed the trend. Ye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the great intelligence of Liu Pang and the other three heroes that initiated the new era. Instead of judging Liu Pang by conventional moral standards or by the value his achievements, Taishih Kung interpreted him within his historical context. Viewed in this light, it is clear that Liu Pang had set the historical precedent for attributing the founding of the Han Dynasty to an ordinary person; it is also clear that Liu Pang's ambition was to achieve hereditary domination. Therefore it is concluded that Taishih Kung's analysis of Liu Pang is noteworthy, for it is not based solely on the character,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is historical figure.

**Keywords:** *Shi-ji*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Liu Pang, Hsiang Yu, Taishih Kung, the exploits of the Three Heroe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Han Xin